

眾以紛訟蕭軍

蕭軍和他的敌友我

秋石 编著

学林出版社



紀念蕭軍誕辰九十周年



我認識蕭軍

蕭軍和他的敵友我

秋石編著

學林出版社

特约编辑:吴家傲

聚讼纷纭说萧军

秋石编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81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天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8 字数 270,000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80616—305—0/1·108 定价 19.00 元

萧军同志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他为了追求进步和光明,两次去延安。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1948年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认为萧军“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这种结论缺乏事实根据,应予改正。1958年2月《文艺报》“再批判”的《编者按语》中,说萧军在延安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这种提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文化大革命中将萧军同志作为“老牌反党分子”关押、批斗是错误的,应该平反。1967年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评反革命分子周扬》的黑文中,定萧军是“反党分子”,这种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其后,某些出版物中沿用萧军是“反党分子”的错误提法,不足为据。现应为他恢复名誉,使萧军同志重返文坛,发挥所长。

——摘自《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此结论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 1980 年 2 月 20 日
批复同意。**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 宣传部
1980 年 4 月 21 日**

尊重历史的事实与魂魄(代序)

严昭柱

前两年,江苏的贺金祥同志(秋石)在《文艺报》发表了两篇颇有影响的文章,都是有关作家萧军的。一篇是《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发表于1994年9月24日;另一篇是《白云原自一身轻——缅怀萧军先生》,发表于1995年7月7日。对于第一篇文章,我还有一点特别的印象。记得当时贺金祥同志除了寄来文章,还附有几页材料,用来说明他写作此文的缘由。材料是复印件,包括台湾《中央日报》1994年1月10日刊登的署名李家的文章《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和福建的《港台信息报》1994年2月6日、13日发表的李家《萧红的风霜爱情路》以及《作家文摘》1994年3月11日对该文的转摘。贺金祥同志在来信中说,台湾《中央日报》的文章多有失实、杜撰或臆造;而《港台信息报》、《作家文摘》实际上是转载台湾的文章,略有删节,却并不注明出处,还换了个文章题目;恐其以讹传讹、谬种流布,因此,特著文以澄清某些事实。我记得当时即将贺的信、文以及材料转呈几位老作家,征求了他们意见之后,决定发表贺文。对于第二篇文章,则只记得它的材料和意义都属重要,所以很快就刊发了。

代 序 1

贺金祥同志最近来信,说他要这两篇文章收入他即将出版的文集,问我是否要说几句话。于是,我又翻出有关材料以及贺文来看,倒也有些温故而知新之感,就趁便谈谈吧。

台湾《中央日报》署名李家的文章,先是题目就教人有些诧异。那题目是《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分明拿女作家的私生活招徕读者,令人发生狭邪的想象,这便把自身降低到地摊上某类小报的格调上去了。诚然,李家文章曾称道过萧红的才情,说“从萧红的作品里我们见证了战争的灭绝和人性的丑陋”——不管它是否正确,总算是一种称道吧,但是这种称道却不属于具体作品。例如李家这样评述萧红的《生死场》:“这部描述农村抗日的写实作品,原本就是紧跟着时代的脉动,加上鲁迅的大力推荐,又披上了‘抗日文学’的宣传美名,立刻激起读者的共鸣。《生死场》使萧红名利双收”;“萧红已因《生死场》闻名,其他作品《商市街》、《桥》、《牛车上》跟着成了‘抗战文学’中的抢手货。”所以,李家强调说:“萧红能迅速走红文艺界,除了本身的才华和勤奋外,靠的是鲁迅的提拔”;“鲁迅夫妇是萧红的再造父母。”字里行间,哪一处就具体作品肯定过作家的才华和作品的成就呢?是没有的。这不仅仅是贬低了萧红以及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的才华和他们的创作成就,而更是在实际上贬低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绩。把作家的才华和成就贬抑下去,而把关系网及其功用编造和突出出来,李家文章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贬低鲁迅、贬低萧红和骂倒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从而把中国现代文学队伍抹得污秽而漆黑了。像这样一篇文章,显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抱有政治性偏见,所以,虽然冠以关于私生活的格调不高的题目,也能够台湾《中央日报》这种政治喉舌上发表,原是不足奇怪的事;而那个带有狭邪气味的题目,倒正好成了掩藏其政治性的巧妙包装。

然而,李家这篇文章,我们有的报刊却加以摘转,同时又不说明这种摘转的事实,使人们对来自台湾《中央日报》的这篇妙文因为不了解来由而缺乏警觉。这不能不说是上了人家的当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凡是台湾报刊上的文章我们一律不得摘转,或者,凡是台湾报刊上讲的事实及道理我们一律不得尊重和参考。不是这样的。事实上,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交往逐渐增加,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愈渐频繁,这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好事,而且因为它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更要努力地将它向前推进。具体到本文谈的范围来说,对于台湾学术界包括文学史研究界的学术成果,不管它是理论性的还是材料性的,我们都要加以尊重,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正是出于尊重,我们摘转台湾报刊的文章就理应注明出处;也正是出于尊重,对于台湾报刊上文章的观点和材料,当然也应该加以科学的考究和审查,这是任何真正的学者都必然要实行的。而且,这里也无法回避、无须回避可能涉及的政治问题。虽然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应人为地混淆,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不应把它硬说成政治问题,疑神疑鬼,节外生枝;但是,也要看到有的学术问题确与政治问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不应无中生有,而真实地存在这种联系的也不应特意抹煞。例如台湾《中央日报》就是一种政治性报刊,我们不能相信它刊发的文章都肯定不带政治性;具体说到李家的文章,它就对中国现代文坛带有政治偏见,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无论是学术见解还是历史材料,如果带有政治偏见,就难免发生谬误或失实。像李家这篇文章,贺金祥同志就发现了“过多”的失实、杜撰或臆造,因此他专门就萧军与萧红有关的部分,站出来撰文加以澄清。贺金祥同志是根据什么“发现”问题和“澄清”事实的呢?是根据他“与萧军先生有过长达9年忘年交

友情”，根据他“与其夫人王德芬多次叙谈”，根据他“与现仍健在的三十年代见证人方未艾（方靖远）、梁山丁、陈堤、关沫南等前辈交往、叙谈”。有这些根据而出来澄清事实，是应该得到我们尊重的。由此我想到，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老作家，现在还有不少健在，有些虽然已经谢世而家属和朋友尚存，他们自己若能写些回忆文章，可以为我们留下珍贵的研究资料，这自然最好；若本人不能写的，其学生、后辈就有责任帮助他们，学习贺金祥同志，和他们交往、叙谈、回忆历史、整理资料，并且在遇上李家那样谬托知己、以假乱真的时候，“愿意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实在是非常有益的。

自然，这里也涉及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有贡献的历史人物的看法问题和态度问题。时下有些作者，喜欢去寻觅有历史贡献的名人的隐私，描绘他们的风流韵事，还要写得特别的香艳，或特别的充满暴力，仿佛我们之所以要记起这些人物，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有所贡献，倒是因为他们是恋爱专家、是问题青年。这不但常常是朝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身上乱泼污水，而且无助于引导今天的人们去对社会作无私的奉献。究其主观原因，这样的作者大都缺乏对有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应有尊重，也都缺乏对大众作有益贡献的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训所谓“为尊者讳”，并非毫无道理。我们当然不应把尊者加以神化，也不应把尊者弱点硬说成优点，但是，对于尊者，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包括革命文学史上的尊者，因为他们是历史的精英，是历史的魂魄，所以，作为文学史的研究，或作为传记文学的写作，我们重点还是讲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学习的地方，这样更有利于引导人们不断进取、积极向上。如果把重点摆错了，着意去发现尊者的缺陷，甚至不惜加以扩大和渲染，那就难免给人造成错觉，仿佛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值得相信、值得尊重的，这于世道人心恐怕是没

有益处的吧。从这样的观点看来,贺金祥同志对萧军的态度就值得赞赏。对于萧军,李家是着意于渲染他“暴烈”、“花心”、“欲望极强”等等,简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贺金祥则强调萧军与萧红二人真挚深切的情感,萧红在香港重病中曾企盼说“如果三郎(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封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这是何等动人的事实;不仅如此,贺金祥还列举事实,说明萧军对毛泽东、鲁迅的敬爱之情,说明萧军在彭真、胡风、丁玲等身处逆境时种种不顾个人安危而仗义执言的感人行动;更重要的是,贺金祥还提供确实的材料,说明了萧军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可贵贡献。两相比较,同是一个萧军,在李家笔下,尊者失真,尊者不尊,甚至是尊者面目狰狞;而在贺金祥笔下,则为尊者传神写照,风骨铮铮,可亲可敬,而其历史贡献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谁对得起历史?谁对得起尊者?谁对得起今人及后人?我想,读者是心知肚明的。

本文从贺金祥同志的两篇文章生发出以上议论。话题虽然很具体,但是我以为实际牵涉的意义,恐怕是不限于对萧军等作家的评价,也不限于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的。

(作者系《文艺报》副主编)

目 录

1	尊重历史的事实与魂魄(代序)	严昭柱
	怀念萧军	
3	一、毛泽东与萧军	
	——兼对《萧军是好人》一文补充与说明	
21	〔附录一〕致《人民公安报》	
24	〔附录二〕《萧军是好人》(原载《人民公安报》)	
31	二、鲁迅与萧军	
51	〔附录一〕鲁迅:《八月的乡村·序言》	
53	〔附录二〕鲁迅:《三月的租界》	
58	三、萧军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	
83	四、但得能为天下雨 白云原白一身轻	
	——缅怀萧军先生	
90	五、萧军与《文化报》事件	
105	六、听萧军谈文学艺术	
110	七、关于萧军与萧红的真实史料	
	——驳李家的《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	
134	〔附录一〕致《文艺报》	
136	〔附录二〕《文艺报》复函	
136	〔附录三〕贺金祥复《文艺报》	

138	[附录四]致《联合报》	
140	[附录五]我撰写《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一文的经过	
146	[附录六]萧耘致《作家文摘》责编的信	
148	[附录七]《作家文摘》报道： 《文艺报》刊登署名文章 对《萧红的风霜爱情路》一文提出质疑	
149	[附录八]《作家文摘》之《来函照登》	
152	[附录九]《萧红的风霜爱情路》	

文献资料

162	一、萧军复查结论	
164	二、冬天里的春天	萧 军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67	三、庆祝萧军文学创作五十年大会发言集锦	
174	四、在上海拉都路我们曾经住过的故址和三张画片	
		萧 军
190	五、侧面《摘录》	萧 军
203	六、在西安	
	——聂绀弩回忆萧红	

往事的哀思

210	一、我和萧军六十年(节录)	方未艾
261	二、点点滴滴 记忆犹新	骆宾基
266	三、挺然一倔竹(节录)	管 桦
271	四、记萧军	雪 苇
275	五、友谊长存	梅 志
283	六、萧军精神不死(节录)	梁山丁
294	七、萧军,大写的人	侯唯动
332	八、白云原自一身轻	陈漱渝

2 聚讼纷纭说萧军

海外的评价

- | | | |
|-----|--------------|----------|
| 342 | 一、怀念萧伯伯 | [瑞士] 赵淑侠 |
| 345 | 二、信徒不必当和尚 | |
| | ——记萧军先生 | [美]葛浩文 |
| 351 | 三、萧军的侧面 | [美]郑继宗 |
| 354 | 做一个大写的人(代后记) | |

怀念萧军

如能早如上的信件而用这
 较用信更一。即
 近作
 叶东
 八月二日

（叶东）
 人民民主。任我原而任之。即
 它用某些七。不要绝对化
 问题。要有耐心。要论定所
 人我深信。要的是动和福利的
 家。有已即。有。有。有。
 其二。其二。其二。其二。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叶东。叶东。叶东。叶东。

叶东。叶东。叶东。叶东。
 叶东。叶东。叶东。叶东。
 叶东。叶东。叶东。叶东。
 叶东。叶东。叶东。叶东。
 叶东。叶东。叶东。叶东。
 叶东。叶东。叶东。叶东。
 叶东。叶东。叶东。叶东。
 叶东。叶东。叶东。叶东。

毛泽东手迹

（给萧军的第一封信）

延安：1941年8月2日

一、毛泽东与萧军

——兼对《萧军是好人》一文补充与说明

1996年3月3日,《人民公安报》在“人世间”栏目里发表了修来荣所著纪实文学《陈龙传》的节选《萧军是好人》一文。

阅后,作为曾与萧军先生有过9年忘年交友谊且多次叙谈过的晚辈,作为在其生命最后日子里的见证人,在这里作一补充和说明。

陈龙是我国隐蔽战线的名人,对人民革命事业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而萧军也是一个名人,是一个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坎坷与不幸、生性耿直、“喜欢到处说三道四”且又常常被人误解的地道东北汉子。历史上,他先后两次赴革命圣地延安。在此之前,早在30年代初的东北,他就参加过共产国际和我党在北满地区所策划的反满抗日地下斗争。后因与女作家萧红一起合著具有鲜明抗日立场的小说集《跋涉》遭日寇通缉而被迫南下流亡。流亡途中,他在我国现代革命文学之父鲁迅先生的一手扶持下,创作了世界上最早一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并蜚声海内外,曾被鲁迅和斯诺赞誉为“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和“左翼作家”之一。而他,恰又是在中国因讲真话最早挨整且挨整时间最

长的作家。1980年4月21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批复的“平反公告”庄重指出:

“萧军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作家!”

萧军首抵延安

萧军原名刘鸿霖,1907年出生于今辽宁省锦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长陈龙3岁,因此,断不存在萧军抵延安时“不满三十”这一说法,这是其一。其二,他于1938年2月27日在山西临汾与萧红分手,决定弃文从武,去五台前线“与日寇面对面地干!”他自临汾随原民族革命大学师生一起经乡宁奔吉县,从吉县他独自一人身背行装,手拄木棒,渡过黄河,徒步20余天,于3月21日抵达延安。由于去五台的路上有战事,只好暂时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招待所。适巧,他的老友、“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丁玲和聂绀弩自西安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住在了同一招待所,得以相遇。之后,在丁、聂二人的劝说下同去西安八路军领导下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由于萧红也在该团并已另择爱人,萧军被迫离开西安去兰州,与现在的夫人王德芬相遇并相爱。结为夫妻后于1938年6月6日赴四川,任成都《新民晚报》副刊主编,“文抗分会”理事。1940年初携妻女转赴重庆“文协”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同年6月,因其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经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及时通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安排下,经乔装打扮后到达西安转赴延安,时为1940年的6月14日,萧军是年33岁。其三,延安的整风及至后来的“审干”、“肃反”为1943—1944年。由于萧军曾对延安一些人批判王实味的过火不实现象表示不满而被扣上“同情王实味”的帽子,一度成为延安的“孤家寡人”。

“审干”开始后，萧军受猜疑及被暗中跟踪、审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决没有“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去对抗中央党校教师艾思奇一说，更没有产生去西安念头，因妻儿皆在身边。至于文中提及萧军“搬回了招待所”后有关毛泽东谈话及“分配工作”之事，也系查无实据。萧军一家住延安至抗战结束，于1945年11月随周扬、沙可夫率领的“鲁艺文艺大队”踏上重返东北的漫长旅途……据此，在此期间，不存在萧军会撇下娇妻幼儿独自在延河滩安营扎寨的可笑举止，而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延安，帐篷又自何来？有关他练嗓唱京剧，是其年少养成的爱好，也为全延安文艺界人所共知。

毛泽东看望萧军

萧军于1938年3月21日首抵延安。次日，毛泽东即从前去汇报工作的丁玲处获知了这一消息。毛泽东很想见见这位当年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先到边区招待所探望萧军，问他愿不愿意去见毛泽东。萧军则回答说：“我打算去五台打游击，到延安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和培元回去后，丁玲劝说萧军：“既然到了延安，机会难得，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去见见吧！”

然而，没及萧军前往，一天上午，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看望萧军来了。同时会见的有何思敬、丁玲、聂绀弩等人，毛泽东还请大家在招待所共进午餐。毛主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以及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令萧军内心深受感动，同时自觉非常惭愧。与毛主席相比，自己年轻气傲，过于渺小了。尤其是当他听说在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作